

汇聚守护力量 共绘云冈蓝图

——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为云冈献礼汇智

本报记者 赵永宏



颁发新增理事聘书

5月12日，一场关乎千年文明传承与石窟寺保护的重要会议在北魏故都平城隆重举行——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第一届第4次理事会盛大启幕。这场会议，不仅是基金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更凝聚着社会各界对云冈石窟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深情守护与殷切期望。

会议伊始，庄重而热烈的颁发仪式

率先举行。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刘建勇，党委委员、副院长何建国亲自为新加入的理事王金华、杜晓帆、张庆捷、吴志群、黄继忠(排名不分先后)颁发理事聘书，这一纸聘书，承载的是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随后，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理事长赵昆雨、秘书长曹保平为捐资、捐赠代表颁发荣誉证书，每一本证书背后，都是一颗赤诚的守护

之心。

捐赠者们纷纷表达了自己对云冈石窟的热爱与守护决心。山西收藏爱好者田亦军先生深情说道：“本是后山人，偶做前堂客。作为收藏爱好者，我们应携手共进，守护好祖国的文化遗产。希望社会各界的捐赠，能唤起广大收藏爱好者的热情，为云冈基金会贡献力量！”

中国农业银行大同市分行捐资代表张慧芬表示：“作为云冈石窟智慧景区建设合作银行，我们愿尽微薄之力赞助基金会，助力其蓬勃发展，也祝愿云冈石窟和保护基金会越来越好！”

山西久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代表陈晓坚定地说：“对基金会的捐赠，是企业的责任担当，也是心灵的感悟。未来，我们会继续履行责任，为基金会添砖加瓦！”

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理事长赵昆雨对各方支持表达了诚挚的感谢：“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成立近半年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无论是捐资、捐物，还是以其他方式表达关爱，都让我们倍感温暖。包括今天未能到场的香港众善堂有限公司，也慷慨捐资70万元。云冈基金会就是要凝聚全社会的力量，扛起保护老祖宗文

化遗产的重任！”

随后，第一届第4次理事会正式会议在理事卢继文的主持下有序进行。理事长赵昆雨所做的工作报告全面回顾了基金会的成长历程：基金会成立以来，先后参加了由省民政厅举办的“加强党建引领，促进慈善组织健康发展”“深入理解把握慈善法律制度，推进慈善组织高质量发展”“加强基金会资金监管，规范基金会财务管理”等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培训，切实履行专项基金管理办法和合作协议。同时，云冈基金会也积极参加云冈研究院组织的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目前，基金会正在申请党建工作。为了更好地提升基金会管理效率和规范化水平，加强内部监督及资金监管，目前正在制定各项规章制度。2024年度工作报告已完成并上传“慈善中国”平台，并向业务主管单位山西省文物局报送相关工作审计报告、报表。2025年更是亮点频出，云冈基金会独立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同时上线，及时发布基金会最新动态、项目进展、石窟保护、公益活动等文章。5月11日，为推动石窟寺研究事业迈向新高度，作为协办单位，与云冈研究院共同举行“2025石窟寺保护与传承学术研讨会”。参与了由中央

美术学院与云冈研究院联合主办的“般若——郑勤砚作品展”。目前正在筹备在北京中小学以及香港举办的云冈主题展览。

会上，秘书长曹保平的财务工作报告顺利通过审议。《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内设机构制度》《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档案管理办法》《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信息公开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也一一接受审议，为基金会的规范运行筑牢制度根基。

监事会代表杨琦对基金会的工作给予高度肯定：“云冈基金会在完善内部治理和优化组织架构上成绩斐然，严格遵循省民政厅要求做好年度总结和审计工作。未来，我们将继续完善管理制度，加强资金监管，确保每一笔资金都用在刀刃上，为基金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新聘理事也纷纷畅所欲言，为基金会的发展出谋划策。曾云冈工作20余年的黄继忠理事满怀深情：“我对云冈石窟感情深厚，今后定会全力以赴做好基金会工作。除了接受捐资，我们还应策划更多有价值的保护、维修、科研项目，吸引更多社会支持。”杜晓帆理事分享了丰富的基金会创建经验：“在项目

资助上，我们要选有影响力的项目，同时兼顾捐资方宣传需求。”张庆捷理事则强调：“我们既要学习他人经验，也要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尤其要加强在企业中的宣传，拓宽资金来源。”王金华理事充满信心：“我将赴京为基金会争取更多合作机会，同时希望基金会在保护研究项目之外，更加重视人才培养。”吴志群理事见证了云冈石窟20多年的发展与变迁，并参与其中，他带着云冈情怀坚定表态：“我和团队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云冈基金会。”黄先锋理事虽未能到场，也通过信函表达了履职决心：“感谢信任，我定以实际行动为云冈石窟保护传承贡献力量。”

会议尾声，云冈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何建国向6位新聘理事致以热烈祝贺：“各位理事在各自领域成就卓越，期待大家发挥深远的社会影响力，为基金会宣传助力，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管理和工作中不吝赐教，带领云冈基金会迈向新高度。”

此次理事会的圆满召开，汇聚了社会各界的智慧与力量，为云冈石窟的保护与传承指明了方向。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云冈石窟这颗璀璨的文化明珠，必将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再识云冈石窟乐器图像(上)

赵昆雨



鲜卑乐人 第17窟东壁

云冈石窟音乐雕刻内容纷繁，有些乐器雕刻至今难以辨识考名，内中原因诸多，有古代匠师艺术创造过程中的写意与夸张，也有今人辨识古代乐器图像的局限性。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经对云冈石窟中的乐器雕刻进行调查，获得些微收获。云冈石窟规制宏大、窟龕众多，当时限于客观条件，许多较高位置的洞窟和较高位置的壁面无法抵近，一些乐器雕刻内容或未能发现，或仅见其大略，加上辨识乐器能力有限，疏漏诸多。近10多年来，得益于洞窟数字化扫描以及大型出版物拍摄项目的推展，窟内多次满铺搭架，有机会近观细察，遂借机重新调查乐器图像内容。

云冈究竟有多少个洞窟内留存乐



第10窟前室东壁南侧大象

器雕刻？数量多少？种类有几种？这些都已不成问题，但云冈石窟乐器图像构成的时代，一直没有明确。当然，北魏乐器雕刻为云冈主体不容置疑，除此，还有疑似辽金时期补刻的乐器，另有明清时代壁画乐器。先说辽金补刻乐器，主要指第11窟中心柱南面立佛背光两侧雕刻的乐伎形像，他们的面相、服饰、乐器等表现与云冈同期北魏造像相比有一定的时代差异性，尤其左侧最下端、菩萨头光上方弹琴的乐伎，且不论貌相，仅凭其坐在方形台座上的演奏形式就感突兀，也怪异，云冈同期类似乐器雕刻20余件，除第38窟音乐树上依经据典地雕刻化生童子坐在莲台上弹琴，其他任何场合下，包括北魏平城墓葬中的奏琴伎，概无坐台座之现象。第11窟是一个未完工洞窟，窟内最初只完成了中心柱的大致样貌即告停工，塔柱下层四面各佛一立佛，周身均被明清塑泥彩绘所覆，唯中心柱南面主佛左右两侧另外配置二胁侍菩萨像，此系辽金时代追刻已为学界公认。二胁侍上方纵向竖列两组乐伎，上述弹琴伎的台座与菩萨圆形头光紧密结合，无打破关系，应是辽人在补雕二胁侍菩萨的同时，在两侧有计划并摹仿北魏风格雕凿的乐伎形像。

至于云冈明清时代壁画乐器，其画风、色彩、形像等时代特征既典型又显著，辨识度较高，况有碑刻题记相佐，时代认定上不存在任何问题。它们集中在五华洞(第9-13窟)，因笼罩在北魏乐器雕刻的辉煌之下，落寞若旁，鲜为人注，向未列入云冈乐器统计数据内，由此造成的误会时有发生，如第10窟后室南壁上层天宫伎乐列龕中一乐伎，北魏原雕已毁失，明清时重新补绘一件横吹，中央设吹孔，两侧开按指孔，有学者认为是“篪”，但进而强调说这件乐器“体现了北魏鲜卑民族对

中原音乐文化的继承、融合与传播”云云，就牵扯太远了——分明是明清时期补绘乐器，与消亡逾千年的鲜卑民族无甚干系。显然，作者误以为凡云冈乐器图像全系北魏所为吧。

新近调查结果显示，云冈石窟目前有30个洞窟内尚存音乐图像，它们是：第1、2、5-4、5-11、5-33、5-38、6、7、8、9、10、11、12、13、15、16、17、20、21、27、29、30、31、32-12、33-4、36-2、37、38、39、40-6窟，乐器图像总量近600件，计34种，分为三类，具体如下：

气鸣乐器11种：横笛、义嘴笛、排箫、角、篪、埙、笙、法螺、吹叶、长笛、筚篥(有大小之分)；

弦鸣乐器7种：琵琶、五弦、阮咸、竖箜篌(亦有大小之分)、琴、箏、卧箜篌；

膜鸣乐器16种：鼓、细腰鼓、齐鼓、檐鼓、羯鼓、杖鼓、毛员鼓、都昙鼓、鸡娄鼓、手鼓、铁鼓、铜钹、碰铃、磬、铎铃、拍板。

除此，石窟中还有不借助乐器实物作乐的形式，如吹指、扑(击掌)、弹指。还有一种情形是，本属乐器，但被使作饰物，如第10窟前室立柱基座下大象背垫上雕饰的悬铃(图3)，同窟后室壁面顶端三角垂饰上缀饰圆形、钟形的铃铎、第16窟南壁屋形建筑物勾连流苏的磬、第6窟南壁浮雕塔檐角悬垂的各种铃等等。

过去一直认为，云冈早期(460~471)昙曜五窟(第16~20窟)乐器雕刻寥落，形式单一，数量亦少，现在看来却非如此，经调查统计，本期发现6组乐队共计35件乐器，数字可观，且胡风突出。它们主要集中在第16、17窟。另，20世纪30年代，第20窟窟前曾出土一件横抱拨奏棒状五弦飞天乐伎雕刻，疑为该窟崩塌物，这意味着第20窟也有音乐造像题材。

第16窟南壁分布两个大型尖拱龕，西侧尖拱龕楣外两隅共雕10身乐伎，他们均梳高发髻，代表汉族形像。



五弦飞天乐伎 第20窟前出土



明清绘画乐伎 第10窟后室南壁

东侧尖拱龕楣外两隅共雕6身乐伎，分别持奏齐鼓、筚篥、铜钹、义嘴笛、排箫及腰鼓，其中，铜钹伎的头顶剃光，只留前额一撮短发，类似鲜卑族髡发，其余数人一概为向后倒梳的髻发，之所以强调其发形的不同，就是要表明他们是来自不同地域的北方少数民族。该窟南壁龕门东侧下端残存一帐形方龕，属云冈晚期补龕，龕外帷帐上方横设一组颇具古风的天宫伎乐列龕，由13身乐伎构成，分别为：筚篥、细腰鼓、琵琶、竖箜篌、法螺、合掌、合掌、琵琶、篪、箫、鼓、细腰鼓。乐伎均梳剃发形，人物面部、服饰包括乐器均不雕饰细纹，居中的3身合掌人物或为歌者。此处篪的出现，不仅为云冈特例，即便北朝雕刻中也属罕见。

第17窟东壁盪形大龕拱端左隅雕2身乐伎，均头戴鲜卑族大头垂裙帽，一人露出半身，持排箫演奏，另一人执拨弹奏琵琶，右腿单盘，空间狭促，况盪形龕拱端两侧通常用来表现菩萨、弟子等天界人物，鲜卑俗人形像并以乐伎的身份出现于此实不如法，显系工匠临时起意擅为。此外，该窟南壁西侧下层盪形龕拱端两隅也新发现持奏横笛、琵琶、鼓的伎乐天雕刻。

《云冈石窟标准化实践》面世

本报讯(记者 赵永宏)5月11日，作为云冈研究院近5年来的一项重要工作成果，在2025年石窟寺保护与传承学术研讨会上，《云冈石窟标准化实践》隆重面世。该书是云冈研究院作为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单位全面总结标准化建设的创新研发成果，由云冈研究院、北京麦斯达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编写，并汇集了11所高校20余位专家学者的心血和智慧。

据了解，5年来，云冈石窟以“重保护、强管理、提服务、树品牌”的标准化建设方针，摸索出系统配套的云冈石窟保护、传承、弘扬、利用的经验做法。“人人学标准、人人懂标准、人人用标准”的浓厚氛围已蔚然成风，标准不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转化为每位云冈人守护石窟的实际行动，切实推动着云冈事业可持续发展。这些成效背后，是云冈人以标准化为笔，在岁月长卷上书写的时代答卷，更是对“让文物活起来”使命的生动诠释。

《云冈石窟标准化实践》系统客观地记录了云冈研究院标准化建设在推动云冈事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的基础性、引领性作用，成为实现云冈石窟传承与利用工作全面提升的重要抓手。

全书分为标准化概述、云冈石窟标准化发展阶段、云冈石窟标准体系建设、云冈石窟标准化实施与改进、云冈石窟标准化建设成效、云冈石窟标准化典型案例、标准化实践前瞻7个章节。书中内容兼具针对性、操作性与可读性，采用图、文、表有机结合的创新形式，每一张图表皆源自标准化建设的实践过程，整合了珍贵的实际工作影像资料，展现了云冈研究院承担多重职责、全面实施标准化战略的创新实践。

《云冈石窟标准化实践》一书填补了文旅融合标准化书籍空白，为全国文化遗产地标准化建设提供了借鉴参考，也为标准化人才培养提供了案例教材。

云冈石窟第3窟出土动物遗存56件



云冈石窟第3窟出土动物骨骼典型标本 1、马右侧下颌骨 2、马右侧下颌骨 3、狗右侧下颌骨 4、猪头骨 5、马荐椎 6、羊荐椎 7、马荐椎 8、猪下颌 9、长骨残块

本报讯(记者 赵喜洋)近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了大同云冈石窟第3窟的考古成果，出土56件动物遗存，考古人员通过科技手段分析，这些动物遗存或与畜力利用、开凿匠人的饮食结构有关。

云冈石窟第3窟位于东部窟群区域西端，是云冈石窟规模最大的洞窟，窟内保留大量的石窟开凿、取石、后世修补及使用痕迹。山西省考古人员第3窟窟前地面和前室地面进行考古发掘，出土大量陶片、瓷片、石雕、钱币、建筑构件以及少量动物骨骼。经鉴定，第3窟出土动物骨骼包括狗、马、猪、牛、羊。

考古人员认为，北魏和辽金时期，主要利用的动物资源是牛和马，羊和

狗在这两个时期没有明显变化，猪则在北魏时期没有出现。按它们和人类的关系，马和牛可能与畜力开发有关，狗可能发挥警卫、陪伴的价值，当这些动物在丧失役使价值后，作为肉食再次利用。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不仅数量少，而且大多破碎，骨骼部位以肉类相对较少的头骨、牙齿、下颌数量较多，仅有少量含肉量较多的四肢骨，反映了较高强度的利用。考古人员推测是开凿石窟的匠人所食用，也不排除是部分僧人所利用。石窟寺等佛教之地出土动物遗存很少见，从动物考古学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修建第3窟的先民利用畜力开凿石窟的场景，也窥探云冈石窟的匠人在大量劳动后对肉食营养的需求。